

中国植物学文献目录

第一册

中国植物学会 编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学文献目录

第一册

中国植物学会 编

主 编：王宗训

副 主 编：张汝炜 李凤琴 姚璧君

编辑组成员：（以汉语拼音为序）

蔡衡芳	陈慧颖	高 燕	官晓林	郭中琳	黄克凡
姜 敏	姜晓岗	李凤琴	刘景相	王瑞芳	王晓洁
王宗训	肖 元	徐竺声	姚璧君	张进珠	张汝炜

科 学 出 版 社

1988

内 容 简 介

本书收集了我国植物学工作者124年(1857—1981)在国内外发表的近代植物学文献约28,000篇,编为文献目录;并收集我国古代记载植物知识的重要书籍百余种编为古书目录。书前写有前言,概略叙述我国植物学发展经过,书后附有按植物学各分支学科分类的索引。

本书为所有从事植物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者的必备参考工具书,同时也是从事农、林、园艺、药学科研和教学工作者的主要参考工具书。

中国植物学文献目录

第一册

中国植物学会 编

*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37号

中国科学院开封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1983年12月第一版 开本:787×1092 1/16

1983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41

印数:0001—3,850 字数:919,000

统一书号:13031·2429

本社书号:3329·13—8

定 价: 6.50 元

Bibliography of Chinese Botany

Edited by Chinese Botanical Society

Editor-in-Chief: Wang Zong-xun

Executive Editors: Zhang Ru-wei Li Feng-qin Yao Bi-jun

Editors: Cai Heng-fang Chen Hui-ying Gao Yan

Gong Xiao-ling Guo Zhong-ling Huang Ke-fan

Jiang Min Jiang Xiao-gang Li Feng-qin

Liu Jing-xiang Wang Rui-fang Wang Xiao-jie

Wang Zong-xun Xiao yuan Xu Zhu-sheng

Yao Bi-jun Zhang Jin-Zhu Zhang Ru-wei

HAD 29/09

前 言

近代植物学在我国萌芽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撰写的文章资料分散在国内外浩如烟海的书刊中。为了总结过去和今后编写植物学史的需要，中国植物学会常务理事委员会委托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图书情报研究室编写了这本文献目录。

一、古典植物学的光辉业绩

植物学是从人类采集植物，利用植物开始，并随着对植物认识的不断扩大和加深而发展起来的。我国最早用文字记载植物知识的书籍是春秋时代（公元前770—476年）成书的《诗经》，这是一部诗歌选集，内容包括周初至春秋中叶（公元前1000—500年）的诗歌300余篇，其中有很多采集和利用植物与农业的记载，记载植物共有132种。

“植物”一词是战国时期（公元前475—221年）成书的《周礼》中提出的。公元前四世纪末成书的《管子》，其中“地员篇”中已谈到各种不同土壤及地下水位高低等生长的不同植物。公元前239年成书的《吕氏春秋》中已有专门论述农业的篇章。东汉（公元前200—25年）末年汇编的《神农本草经》，收载药物365种，其中有植物药物252种，从此开始了植物学的本草时期。公元一世纪后期成书的《汜胜之书》对于农业选种、耕作技术已有论述。在欧洲自公元前370年左右出现Theophrastus的“植物史”（*Historia Plantarum*）和“植物本原”（*De Causis Plantarum*）之后，至公元二世纪末以前，虽出现一些农业、园艺、本草的著作，如Cato（公元前234—149年）、Varro（公元前116—27年）、Vergil（公元前70—19年）、Dioscorides（约公元64年），和Galen（公元130—200年）等的著作，但其中只有Dioscorides的本草（*Materia Medica*）比较杰出，曾沿用许多世纪，此后直至16世纪以前未出现与植物学有关的有重大发展的著作。而在这个时期，我国的古典植物学却在飞速发展。现列举几项重要著作以说明我国这时期的成就。

梁代（公元502—507年）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是《神农本草经》之后直至《唐本草》之前的一部划时代的本草书。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成书于533—544年，是一部较为系统的古代世界农业科学技术名著，介绍了我国黄河流域各种农作物、蔬菜、果树、林木的栽培、动物饲养和农产品加工等。公元659年成书的《唐本草》是世界最早的一部药典和附图的本草书籍，比国外最早的纽伦堡药典（1542年）早9个世纪。于1086—1093年成书的唐慎微的《证类本草》，在本草书中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此时期我国出现的许多专志类书籍，不仅在世界古典植物学史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并且表现出我国的特色。如8世纪后期陆羽著的《茶经》，晋或宋代戴凯之的《竹谱》，1031年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1059年蔡襄的《荔枝谱》，1073年刘攽的《芍药谱》，1104年刘蒙的《菊谱》，1178年韩彦直의《橘录》，1186年范成大的《范村梅谱》，1233年的赵时庚的《金漳兰谱》，1245年陈仁玉的《菌谱》，1341年前柳贯的《打枣谱》等。此外嵇

• i •

含的《南方草木状》，虽然有人认为是晋永兴元年（公元304年）成书，有人认为是唐宋之间，因而成书年代还未最后确定，但最晚也在南宋（公元1127—1279年）以前，无疑还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古典式“地方植物志”。1082年周师厚的《洛阳花木记》是最早的观赏植物专书之一。1253年以前成书的陈景沂著《全芳备祖》，为我国最早的一部古典式“植物志”。1406年朱橚著的《救荒本草》，收录开封及豫北晋南野生可食植物414种，每种植物都经栽培观察记录，据实绘图，图精美准确，食用方法合乎近代科学，本世纪40年代出版的日本食用植物书籍仍引用该书。

16世纪期间西方本草学虽也略有发展，但我国1590年成书的李时珍著《本草纲目》总结了我国历代本草的精华并有新的重大发展，在国内外古典植物学本草时期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因而成为有世界影响的本草学名著。

自17世纪开始，西方植物学已从本草学时代向近代植物学时代过渡。我国仍处在本草学时代。在这个时期我国仍有许多值得提出的著作，如1621年王象晋的《群芳谱》和以此书为基础的1708年汪灏等的《广群芳谱》。1628年以前成书的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在古代农林文献中，可以称为是最博洽的综合性著作。1634—1638年间成书的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在有关农产品加工的记载方面，是继6世纪《齐民要术》以后最好的一部著作。1846年前成书的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绘图描述和记载的精确，收录植物种类之多，在古典植物学中已达到最高的水平，也标志着我国古典植物学将近结束。

二、近代植物学的交融孕育

在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不断侵略我国，腐朽残暴的清朝统治者对外订立屈辱条约（天津条约1858年，北京条约1860年），对内血腥镇压农民起义。与此同时，西方文化逐渐输入我国。这时兴起了一阵“学洋务”翻译西书之风。植物学方面这时在西方自1665年Hooke用显微镜观察到细胞，经近200年的研究进展，正在建立生物组织都是细胞组成的，细胞核和原生质是生命的物质基础的“细胞学说”。1858年7月1日达尔文在林奈学会宣读了他的“物种起源自然选择”的论文。植物分类系统已由人为的趋向于注意自然亲缘关系的系统，如1824—1874年DeCandolle父子的《植物界自然系统序论》（*Prodromus Systematis Naturalis Regni Vegetabilis*）。植物生理学在矿质营养、光合代谢、生长、运动各个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植物形态学、古植物学等分支学科也初步建立。就在这个时期我国的李善兰（1811—1882年）和英国的韦廉臣（A. Williamson）等合作编译的《植物学》于清咸丰八年（1858年）由上海墨海书馆出版。全书共八卷，约35,000字，插图200多幅。内容是根据英国J. Lindley（1799—1865年）的《植物学纲要》（*Elements of Botany*）中的重要篇章编译而成。书中主要介绍了当时新的植物学基础理论知识，包括植物的地理分布，植物的分类方法，植物体内部组织构造和细胞的各种形态，植物体各器官的形态构造和功能以及植物的雌蕊（他译为“心”）和雄蕊（译为“须”）的形态和受精生殖作用等。由于李善兰是第一个翻译西方植物学为中文的人，所以他必须创译很多植物学名词和术语，如细胞、萼、瓣、心皮、子房、胎座、胚、胚乳、分类学上的“科”名和伞形科、石楠科、菊科、唇形科、蔷薇科、豆科等都是从他笔下首次出现的。Botany之译为“植物学”也是从李善兰开

始,此词不仅我国沿用了下来,而且也为日本植物学家所采纳,日本曾将Botanica译为“普它尼克经”,还用过“植学”一词,自李善兰所译“植物学”传入日本后,“植物学”一词在日本也沿用至今。李善兰的植物学可以说是近代植物学在我国的萌芽。

自1857年至本世纪20年代初的60多年,可以说主要是由我国近代植物学家传播知识,培养人才,建立实验室、标本室的准备时期。这个时期由于国内仪器设备标本图书都很缺乏,发表的文章只有极少数是原始论文而且是借助国外的设备完成的,如钱崇澍1916年的《宾州毛茛的两个亚洲近缘种》和1917年的《钽、铌、铈对于水绵的影响》,是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和植物生理学第一篇原始著作,但都是在国外发表的。我国最早的一种中文科学期刊是《格致汇编》,是由英国人傅兰雅(John Fryer)主编的,于清光绪二年(1876)创刊,出版了七年,此期刊中的很多文章都是翻译或综述的,没有作者姓名。文章大多为物理和化学等方面的,植物学的不多,如1876年有《论植物学》三篇,有《潮水与花草树木有相因之理》,《大莲花》,《城市多种树木之益》,《有益之树易地迁栽》,《西国种茶树》,《令植物能睡》各一篇,1877年有《种树不但有利于己而且有益于人》,《农事略论》,1879年在《化学卫生论》中有“霍布花等醉性之质”和“论所酿五谷等酒”,1890年有《西国名菜佳花记》,并自1890至1892年间连续载有《泰西本草撮要》十余篇。

上海务农会主编的《农学报》系旬刊,1898年创刊,出版了8年,共出311期。1904年上海科仪馆出版的《科学世界》系月刊,但只出10期,1909年金陵大学创办了《金陵光》,系季刊,双月刊,出版了很多年。1910年中国地学会创办了《地学杂志》系季刊,月刊,也出版了很多年,1914年中华博物学会主编的《博物学杂志》,1915年科学社主编的《科学》和当时的一般性杂志如《学生杂志》,《东方杂志》,《中华学生界》都刊载了一些植物学文章,这些文章中大部分都是翻译的或综述的,而且有少数文章未列作者姓名或用笔名。这个时期发表的有关植物学文章约有200余篇,以植物分类和植物生理方面的为多,各有30余篇,其他分支学科也多少不等,各有若干篇。现就每个分支学科各举一两篇为例,并列举这个时期出版的有代表性的几本书籍以见一斑。如王丰镐1898年译的《论橡胶》,《论麦病害》和《论植物吸收地质多寡之率》三篇文章,虞和寅1904年的《植物学略史》,《植物对营养之适应说》,《植物受精说》等三篇文章,虞翼祖1904年的《有用植物及有毒植物述略》,胡雪斋1904年的《植物营养上之紧要原质》,海筠1914年的《以脱(ether)有助草木生长之能》,王彦祖1915年的《植物普通名与拉丁科学名对照表》,吴斐文1915年的《植物之知觉》,邹秉文1916年的《植物病理学概要》,梅禹1916年《植物成长上所受外界影响之研究》,吴元恣1915年《显花植物与隐花植物之生殖及世代交替》,沈煦1913年译的《两全花之授精》,志厚1915年的《植物与温度之关系》,笠民1915年的《说明植物的形态及生理》,陈寅1918年的《植物成分之研究》,蔡无忌1918年的《植物同化作用浅说》和《植物蒸腾作用》,张石朋1917年的《植物之变化》及《论植物之雌雄性别及其变化》,吴元恣1919年的《土壤中之下等植物与人生之关系》,缪德载1920年《植物灵性遗传之研究》,张作人1920年《花青素与变换花色法之研究》,毕祖高1918年的《单子叶植物与双子叶植物先后之研究》,刘寿鹏1919年《植物异物同名考》,张维寅1920年的《新发见昆布科植物之生殖法》,李顺卿1921年《植物社会进化论》等。我国植物学界老前辈钱崇澍1915年就译有《生命论》,

《天演论》二文，以后并译有多篇植物生理的文章。胡先骕在1915—1916年发表有数篇《说文植物古名今证》，1917—1918年也译有《中国西部植物志》等。

从以上举例可以看出这个时期期刊上的文章已涉及到植物学当时的各个分支学科。这个时期出版的书籍也反映了当时的植物学水平，1906年山西大学译学院译有《植物学教科书》一册，比较简单。1908年出版的叶基楨撰写的《植物学》就包括了分类、形态、解剖、生理、古植物，应用植物学等各个分支学科，还包括了少数我国的资料，叶是京师译学馆的博物学教授和农事试验场（场址即今之北京动物园）场长，书是铅印，图都是用铜版纸，很精美。1910年李煜瀛在巴黎远东生物学会著有《大豆》一书。1911年商务出版了奚若、蒋维乔的《植物学教科书》一册，不再详细介绍，值得提及的是1918年商务出版的孔庆莱，黄以仁，杜亚泉等13人编写的《植物学大辞典》，蔡元培曾为之作序，内容虽多取材于日本的材料，但对于我国植物学的发展起了推动的作用，此书曾多次再版。著者中黄以仁多年在大学任教，抗战初期病逝于河南大学，杜亚泉在30年代还曾编写出版数册植物学书籍。邹秉文、胡先骕、钱崇澍合编，1923年商务出版的《高等植物学》曾在国内各大学作为主要植物学教材多年，是当时一部重要教科书。

自1909年开始许多大学设立农林科，博物部，生物系等培养植物学人材的部门。如1909年金陵大学设立农林科，1910年湖南高师设立博物部，1912年南京高师设立农科，1913年设立北京农业专科学校，1916年北大设立生物系，1917年中华农学会在南京成立，1922年中国科学社在南京设立生物研究所，1923年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在广州都设立农学院等等。这些部门机构的设立，一方面学习当时的近代植物学知识，所以有上述文章、书籍的出版，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标本室实验室的建立，使我国植物学家能自己进行科学研究。

三、解放前植物学工作者艰苦创业

在植物学中植物分类学先走了一步。自18世纪始直至本世纪初，我国的植物都是外国人来采集标本，拿到国外的标本室进行研究。我国学者采集标本的首先是钟观光，他自1910年左右开始在湖南高师和北大任教期间先后采集了多于15万号的标本。他因受我国早期研究植物分类的影响，终身从事以近代植物分类学方法考证我国古籍中植物名称的工作，同时力求精确，极尽完善，但不肯轻于发表，以致终生发表文章不多，他给我们留下早期他采集并已鉴定的大量标本，是值得纪念的。1919年陈焕镛到海南岛调查采集标本，1923年陈焕镛、钱崇澍、秦仁昌等到湖北西部调查采集标本。在20年代初左右的几年的时间里我国学者采集标本建立标本室的逐渐增多，发表了很多地区的植物名录类的文章，如1918年张珽的《武昌植物名录》，同年韩旅尘的《广东植物名录》，1919年钱崇澍与N.G.Gee的《江苏植物名录》，同年辛树帜等的《湖南植物名录》，1921年胡先骕的《江西和浙江植物名录》同年刘振业等的《河南植物名录》，王有琪的《南京自生植物之调查》。1918—1924年连续发表多篇的陈嵘的《中国树木志略》和1924年钟心植的《中国木本植物名录》，已扩大到全国主要木本植物。周汉藩同年的《湖南植物图志》引证了很多古文献。1927年钱崇澍《黄山植被和植物区系》一文是我国最早的地

植物学文章, 1916—1920年期间邹秉文、戴芳澜开始了真菌和植病的研究工作。植物生理学方面钱崇澍自1917年发表了一篇论文后, 即侧重于植物分类学的研究, 在1925—1931年期间罗宗洛、李继侗、汤佩松先后开始了植物生理学的研究。古植物学方面周赞衡于1923年发表了《山东白垩纪之植物化石》的文章以后, 自1930年开始斯行健发表了很多著作。植物形态学方面张景钺于20年代在国外开始了研究, 回国后培养了很多有声望的形态学和其他方面的学者, 如徐仁、王伏雄、梁家骥、李正理、曹宗巽、高信曾、朱激、胡适宜等。严楚江于30年代初在国外也开始了研究, 回国后也培养了很多的人材。在植物化学方面以药物化学开始的较早, 袁淑范、赵承嘏、赵桔黄、汤腾汉等在20年代即开始了研究。蕨类植物的研究秦仁昌自1927年即已开始, 遗传育种方面的工作是从改良农作物开始的, 汤惠荪、丁颖、冯泽芳、叶元鼎等许多农业学家在20年代就开始了稻、麦、棉等方面的工作。

1924年钱崇澍在科学社生物所设立了植物部, 1928年胡先骕在秦仁昌等的协助下建立了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部, 1929年刘慎谔在林镕、夏纬瑛、孔宪武等的协助下建立了北平研究院植物所, 同年中央研究院建立了自然历史博物馆, 并于30年代初改名动植物所, 1930年陈焕镛创立了中山大学农林植物所。由于这几个研究单位都侧重于植物分类学的研究, 无形中形成了植物分类的几个研究中心, 积累了大量标本, 出了不少研究成果, 培养了很多有声望的人材。当时除这几个研究单位外, 还有不少大学也作了很大的贡献。如清华大学的吴蕴珍, 协和医学院的刘汝强, 金陵大学的陈嵘等等。

在30年代之前虽然也作出了一些出色的研究工作, 但因人数少, 经费支绌, 有不少学科仍是空白。自30年代初至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 除少数分支学科外, 可以说是解放前植物学最兴旺的时期。种子植物分类在上述几个中心机构有较大的阵容, 每个机构都至少出版一种期刊, 刊载研究论文, 并各出有图志等类的书籍, 都有出色的研究成果。在真菌植病方面戴芳澜、邓叔群、朱凤美、俞大绂等, 从问题的不同方面作出了很多贡献, 魏岩寿、施有光、周宗璜、凌立、魏景超、欧世璜、王云章、方心芳、阎玟玉、黄逢源等在这个时期也作了不少与农林业有关真菌和工业真菌的工作。王志稼、李良庆、饶钦止先后开始了淡水藻类的研究工作。1933年曾呈奎、焦启源同时开始了海藻工作。苔藓方面的工作在20年代就已开始, 1928年开始发表论文, 但为数很少。植物化学的工作在药物研究等部门进行了不少的研究。木材解剖和植物细胞的研究也有人开始。遗传育种方面由于农业的需要在农业部门也发展起来。这个时期也兴办了几座植物园, 南京中山植物园是叶培忠于1929年建立的, 庐山植物园是在胡先骕发动下与江西农学院协作, 由秦仁昌、陈封怀于1934年建立的, 还兴办了一些其他植物园(如钟观光1919年左右在杭州办了一个小植物园, 刘慎谔1930年在北京办了一个小植物园), 但大多未保存下来。这个时期发表的有关植物学论文每年已有数百篇。就在这个时期的1933年8月中国植物学会诞生了。

自1937年至1949年这个时期, 由于抗战开始许多研究机构和大学内迁, 抗战后又回迁。图书资料标本仪器设备损失惨重, 加以国民党贪污腐化, 通货膨胀, 国民党统治区的不少科学家们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 食不果腹, 衣不蔽体。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 很多植物学家仍坚持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 作出了不少成绩, 培养了很多的人材。尤其许多植物学家不仅继续研究了本人过去研究的工作, 而且对内迁后的当地植物进行

了调查研究。现也只能举少数事例以见一斑。在植物分类方面如胡先骕、郑万钧之发现“活化石”水杉，刘慎谔写作云南植物地理，林镕对福建植物之研究，钱崇澍、杨衔晋对重庆北碚植物之研究，俞德浚对云南经济植物和茶花的研究，陈封怀对云南报春的研究，裴鉴的川康经济植物名录，张肇基、汪振儒、钟济新等对广西植物之研究，耿以礼对西康及甘青植物之研究，孔宪武对陕西渭河流域杂草的研究，赵修谦在福建发现川苔草科，秦仁昌除继续发表多篇蕨类论文外并对云南和贺兰山植物作了调查；汪发缙、唐进继续对百合科和兰科、蒋英对夹竹桃科，单人骅对伞形科，周太炎对十字花科进行了研究，方文培编写峨嵋植物图志；郝景盛撰写了数本木本植物的书籍；崔友文、钟补求、王作宾、傅坤俊等对秦岭植物作了多次调查；在苔藓植物方面陈邦杰发表了多篇论文；藻类学曾呈奎发表了十余篇海藻的文章；饶钦止发表了十余篇淡水藻的文章；在植物生态方面侯学煜对四川贵州的植物生态、吴中伦对峨嵋山和青衣江的植被都发表了数篇文章；徐仁对于云南、湖南的古植物学进行了研究。在植物生理方面汤佩松在昆明大普集清华大学农研所建立植物生理组，成为我国当时植物生理研究的一个中心，他和殷宏章、姜成后、罗士苇、潘尚贞、陈华癸、张信诚、胡笃敬、薛应龙等人进行了一系列生长素、生物化学、生物物理、植物油、微生物生理、抗生素及植物感应性工作，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培养了不少有声望的植物生理学家，在艰苦的岁月里为此学科今后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罗宗洛、崔激、汤玉纬、黄宗甄、倪晋山等发表了多篇生长素、矿质营养和微量元素的文章，罗宗洛并于1945年主持了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在真菌植病方面戴芳澜、邓叔群等很多学者作了不少的工作，方心芳、谈家麟、施有光等对工业真菌作出了很多成绩。

以上只是挂一漏万地把解放前植物学发展的轮廓粗略地进行了勾划。因在本文献目录中收录的解放前有关植物学文献约有8000条，书后备有索引，可以查考，在此就不详细叙述了。

四、解放后植物科学事业蓬勃发展

1949年新中国建立，党和政府对科学非常重视，首先根据植物学工作者的要求和植物学发展的需要调整了旧有的机构，如在北京将原静生生物所植物部分和北平研究院植物所合并成为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继于1952年因增设了植物生态地植物学室，植物细胞室，植物园等分支学科研究部门改称为植物研究所。在原有基础上在昆明设立昆明工作站，后发展为昆明植物所，在武功设立西北工作站，后发展为西北植物所，在南京设立南京工作站，后发展为江苏植物所，在庐山设立庐山工作站，后发展为庐山植物园，在广州设立华南植物所，在上海设立植物生理所，在沈阳建立林业土壤所，在植物分类所真菌部分，农业大学的真菌植病部分成立了应用真菌所，1959年它和菌种保藏会合并建立了微生物所等等。50年代初国家经济还不宽裕的时候，就拨出了大量经费发展科学。不仅添加了大量图书仪器设备，增加了人员，使植物学家们不再由于经费困难而影响工作和培养新生力量。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在解放前由于交通不便，我国学者很少前往考察，只有刘慎谔等少数植物学家经过千辛万苦考察过一两条线，因此标本材料极为缺乏，建国后不久即连续组织各方面力量进行了多次考察。秦仁昌曾带队亲往新疆，钟补求、崔友文在西藏最初的考察里都曾亲自参加。50年代初组织的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考

察,橡胶宜林地考察及南水北调考察等,有许多研究单位和大学参加林谔、张肇霖、李继侗、吴征镒、侯学煜、蔡希陶、秦仁昌等都亲自参加并率队工作。这些考察不仅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有用资料,也为植物学研究积累了珍贵资料。在植物分类方面,50年代初先编写了与农业生产关系较大的豆科和禾本科植物图说,后编写了《中国种子植物科属辞典》。1958年开展的全国野生经济植物普查,一年内进行了上万次调查,采集了20多万号标本,完成了上万次化验,于1960年经各植物学研究单位,商业部门、医药部门和工业部门,大专院校有关的52个单位共同协作编写《中国经济植物志》两巨册,约250万字,于1961年出版。植物分类学工作者长期以来所期待的光荣任务——编写《中国植物志》,经过了多年的努力,条件接近成熟,1959年科学院批准设立中国植物志编委会领导此项工作,同年10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中国植物志》的第一本,即第二卷蕨类植物部分正式出版,这是秦仁昌几十年研究蕨类的心血结晶的一部分。目前《中国植物志》已出版30卷,另有12卷在印刷中。这些卷植物志有的是老一辈几十年努力亲自写出的,有的是老一辈与年青一辈合作编写出的。有的是老一辈已经逝去,由年青一辈在老一辈的基础上写出的。许多地方植物志和地方经济植物志也已出版,如《广州植物志》、《海南植物志》、《江苏南部植物手册》、《北京植物志》、《秦岭植物志》、《东北木本植物志》、《东北草本植物志》、《内蒙古植物志》、《湖北植物志》、《四川植物志》以及各省市出版的药用植物手册和经济植物志。《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五册的发行,初步适应了我国各方面对植物分类的急需。此外还有一些按原料类别编写的专书,如造纸纤维、油脂植物等。除以上所述的书籍外,发表的论文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比解放前大为提高,新属新种甚至新科的发现,已屡见不鲜。研究亲缘关系的新系统文章,也逐年出现,如蕨类植物系统、裸子植物系统、被子植物多元系统以及蔷薇科、唇形科、兰科等科的系统,马先蒿属植物的系统等等。研究植物区系的工作如中国植物区系分区的研究以及探讨植物地理的工作都已达到了新的更高的水平。在苔藓学方面解放前力量也很薄弱,解放后队伍扩大了数倍。专科专属的系统著作显著增加,刊行了《中国藓类植物属志》、《东北藓类志》、《东北苔类志》和《秦岭藓类志》。苔藓植物地理和生态群落的组成等方面也开展了一些工作。在藻类学方面建国后也有很大的发展,不仅发表的论文和报告有所增加,而且发展了藻类遗传学等新的领域,出版了《中国经济海藻》、《海带养殖学》、《中国黄海海藻志》、《海藻化学与海藻工业》等书籍。解决了商品海带种植南移问题,并培育了优良海带新品系。第一次系统地完成了紫菜生活史的研究,为紫菜的大规模采苗、养殖解决了问题。系统地进行了海洋、湖泊、水库、河流的藻类调查,初步了解了我国海藻和淡水藻的生态,分布和种类数量的变动情况,并在藻类区系、分类和演化系统等方面完成了不少的研究工作。对固氮蓝藻、小球藻和扁藻的培养利用以及海藻胶质提取条件等方面作了不少工作。在真菌学方面,真菌分类和区系工作发展得最快,发表了许多论文和专著,1973年成立了中国孢子植物志编委会,大大推动了《中国真菌志》的编著。在真菌生理方面也作出了许多贡献,如通过生理分化的研究,鉴别出一些重要病菌的生理小种,通过休眠期和光照期的研究,解决了水稻粒黑粉菌和小麦秆黑粉菌的孢子萌发问题。发现米麴霉有两种不同的酶。合成了桔霉素并已付应用等。在益菌利用方面也进行了不少的工作,如用酵母菌和淀粉酶菌使酒精发酵,蚕丝脱胶,皮革脱毛和柔化,用蛋白酶制酪,用酵母菌

和链包霉作饲料。用桔抗菌防治棉花病害,用麦角菌生产麦角碱,用核黄菌生产核黄素以及培养银耳、侧耳、冬菇、黄菇、木耳、香菇、猴头菌、蜜环菌等等方面,也都获得成功。在害菌防治和控制谷类病害流行方面也都作了一些研究工作,并取得了成绩。地衣学在解放前几乎是空白,建国后也开始有所发展。

解放前很薄弱的分支学科——生态地植物学,建国后也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在多年来大量研究资料的基础上《中国植被》和400万分之一的《中国植被图》已经出版。在指示植物地理学和实验群落学、栽培植物群落的研究,以及树木、农作物、牧草和其他经济植物生态、环境污染与植物的关系等方面也作了很多工作。

解放前的空白学科,如孢粉学,建国后不仅建立起来,而且已发展了有数百人的研究队伍,不仅满足了探矿医学等经济建设的需要和其他分支学科的需要,而且发表了出色的研究论文、专著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资料。植物化学解放前在药物研究单位和化学研究单位虽然有一定的力量,但在植物研究单位却几乎是空白,建国后植物研究单位补充了这方面的力量,导致发现了许多新的有价值的植物资源,对于国民经济建设贡献了力量,其中如江苏省植物研究所等的激素原料,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昆虫蜕皮激素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等的田菁胶都得到了国家发明奖,还导致早在1963年就出现了化学分类学的文章。在组织培养,尤其是花药培养和茎尖培养方面,在理论上和经济利用上都作了贡献。在植物生理、生化、生物物理方面,在过去的基础上不断扩展,除解放前已有一些基础的无机营养、生长、代谢、细胞生理等仍继续不断出现新的研究成果外,解放以前研究较少的物质运输、光合作用、抗性生理、射线生理等也都有不少的研究工作。如通过韧皮部的物质运输机理的新假说、光合磷酸化反应的机理、呼吸代谢的多条途径和它们的调控及与其他生理功能的相互作用等方面都是通过大量的研究工作得出的。满江红的培养和研究以及生物固氮的研究也获得了有水平的成果。在植物形态学和植物细胞学方面,解放前的工作是比较零散和不多的。解放后在植物发育形态、比较解剖和发育解剖、植物胚胎、实验形态解剖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植物细胞学方面,关于细胞核迁移的一系列研究已成为上述韧皮部的物质运输机制假说的部分证据。人工引变多倍体的研究,对我国今后培育新作物品种提供了新途径,被子植物和裸子植物雌雄核融合的方式的不同的细胞生物学、形态发生和超微结构的观察以及黑麦小麦体外受精的研究,都很有意义。新发现的“活化石”银杉通过胚胎学、形态学和解剖学、植物化学的比较研究,确定其系统位置的工作,是我国大协作研究的具体事例。在古植物学方面,解放以后的工作多以配合地质普查中的地层鉴定为主,在大化石方面曾出版中国古、中、新生代植物化石等专著,并发表多篇论文。在孢粉学方面发展较快,自1954年以来已完成不少的工作,除出版了中国有花植物和蕨类植物孢粉形态学两部专著外,还提出了很多地区有关古气候、古地理和古植被的资料。在植物遗传育种方面在解放前已进行了一些工作,解放后紧密联系生产实践培育出不少农作物和园艺作物优良品种,为农业增产作出了贡献。在杂交优势理论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特别是雄性不育的材料利用和理论方面,对水稻、玉米、高粱等都进行了工作,取得了成绩。在多倍体问题和遗传规律的研究方面也都进行了一些工作,在遗传工程方面也开始进行探索。在植物引种驯化和品种资源调查保存方面解放后也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不少的成果。解放前只有两四处植物园,解放后增添了十余处植物园,最近中国农业科学院又增设了品种资源

研究所，各地植物园引种了国内外大量的果树、药用植物、芳香植物、油料植物、观赏植物等经济植物种类和品种，品种资源所收集和保存了大量农作物种类和品种，这些园和所各类植物的育种准备了“基因”材料，并且已育出一些有经济价值的植物品种进行推广。

以上主要是根据这次编写《中国植物学文献目录》时收集的材料，粗略描绘了我国植物学发展的概略。有些分支学科写得过于简略，有大量遗漏。该目录收集至1981年底止，已有文献约28,000条，包括解放前约8000条，解放后约20,000条。据统计，目前各种期刊（如植物学报、植物分类学报、植物生理学报、植物生态学与地物学丛刊、植物研究、云南植物研究、广西植物、西北植物、微生物学报、古生物学报、海洋学报、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实验生物学报、药学报、遗传学报、园艺学报、中国科学等有关学报以及各大学刊有植物学论文的学报约有40余种，此外如生物学通报、植物生理学通讯、植物杂志等中级和科普期刊也有不少好的植物学文章）每年发表的比较有水平的植物学论文共约2000篇。如此众多的论文，综合起来，比较困难。好在该书之后备有分学科索引，可以查找。

回忆我国近代植物学百余年来，从无到有，从简单的低水平到目前的多分支学科的高水平，是几代人的努力才达到的。中国植物学会1933年建立时仅有105名会员，到1963年就有了3006名会员。目前因尚未完成新的注册，确实人数还不知道，但肯定比1963年要多得多。我们植物学有这样一支强大而有经验的队伍，有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领导，前途将是无限光明的。但是科学的发展是无止境的，植物学及其各个分支学科的发展也是无止境的，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团结协作，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作出更多的成果，为植物学学科的发展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作出重要的贡献。

《中国植物学文献目录》编辑组

1982年8月

序 言

近代植物学在我国自萌芽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发表的文献分散在浩如烟海的国内外书刊中，过去从未编印过一本比较完全的包括植物学各分支学科的文獻目录。这种文献目录不仅为了解我国近代植物学的过去所必需，而且在日常研究工作中也是一本重要的参考工具书，因此，过去曾有许多位国内外的植物学家建议编辑这样一本目录。

1983年8月是中国植物学会成立50周年，学会常务理事会决定届时将开会庆祝，会议除进行各种学术活动外，并决定在会前编印一本《中国植物学文献目录》，以便开会时能人手一册，供总结我国植物学过去的参考，同时亦可满足国内外许多植物学家要求编印我国植物学文献目录的愿望。

编写文献目录的工作，中国植物学会常务理事会委托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图书情报研究室承担。因决定编写此一目录时已是1981年3月，而且印刷出版需要一定时间，所以实际编辑时间只有一年多一些。任务艰巨，时间紧迫。图书情报室接受任务后立即压缩原有室内工作，组成了有18位同志参加的编辑组，突击此项任务。为了避免遗漏过多，搜集资料采取了三条途径：1.逐一查阅与我国植物学有关的中外书刊；2.逐条查阅有关的文献目录、文摘等二次文献；3.发函千余封至植物学有关单位和植物学家征集个人著作目录。通过这样三条途径收集资料，虽不免要作重复工作，但可避免重要遗漏。要查全我国近代植物学著作，需要翻阅一个世纪以来的所有有关中外书刊，不仅是一项十分繁重的工作，而且任何一个图书馆都未将此一时期的书刊收藏齐全，我们曾查阅了几个重要图书馆的藏书，但由于我们人力、水平和时间的限制，一定还有重要的遗漏和错误，敬请被漏列和错列文献的著者原谅并望通知我们，以便以后补充更正。

植物学是一个与农、林、园艺、药物和化学等学科交叉的学科，如何分界，各人的看法很不相同，许多文献确实又可属于两个学科。本书既为植物学文献目录，理应突出植物学，据此我们规定了一个范围（见说明）。这个范围只说明我们收集资料的范围，并不是为植物学与其他学科分界作规定。同时我们在收集资料时由于每个人掌握的尺寸不尽一致，所收资料的范围也不尽相同。

本书收集文献侧重于原始论文，综述和提高性的论著。翻译和通俗性文章书籍也选收一部分，收集的范围也作了几条规定。同样，这些规定只说明我们收集文献的范围，不表示已收及未收文献是否重要。

本书所收文献都是我国学者的作品。我国学者和外国学者合作的作品也一并收列，在著录中注出。有的我国学者已改入其他国家国籍，但其论著仍收入本书。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自始至终承汤佩松、俞德浚两位教授和鲁星同志经常给予鼓励、支持和指导，植物所很多同志和学会的常务理事、专业委员会的同志提供很多宝贵意见，谨表示衷心的感谢。在征集个人著作目录过程中，承二百余位植物学家在百忙中整理出目录寄来，尤其使人感动者几位植物学界老前辈虽年高体弱，仍将个人著作目录整理寄来。南京大学叶德娴和曾昭琪两位先生听说我们编辑文献目录，先将个人积存的藻

类文献卡片寄来，以后又将油印本的藻类文献目录寄来。江苏省植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将该所编印的该所发表的论文目录寄来，供我们参考，使本书更臻完善，均此致谢。南京中山植物园最近也将该园发表的论文文摘目录寄来，虽然收到时本书已经定稿，无法再补充编入，但以后本书编增订本时，一定补充编入。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全国地质图书馆、中国农业科学院图书馆、中国林业科学院图书馆、浙江农业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科技图书馆等很多图书馆，对我们查阅资料给予了方便和帮助，均此致谢。

今年春季在一次植物学会常务理事会扩大会上建议我们写一篇我国植物学发展概略作为前言，以便读者可以简单概括地了解我国植物学发展经过，我们原期望能有一位植物学界老前辈执笔，但因老前辈们都年高工作忙，至七月份尚未落实，因时间不能再延。我们学习了胡先骕、林谔、张肇骞、汤佩松、吴征镒等各位老前辈写的有关植物学概况的文章，参照这些文章并根据这次收集的文献，写了前言初稿。初稿完成时已接近今年八月份学会常务理事会会期，匆匆请俞德浚教授和鲁星同志给审阅修改后，即打印分送参加会议人员审阅修改。承汤佩松、陈封怀、汪振儒、王云章、鲍文奎、杨衔晋、徐仁、王伏雄、盛诚桂、慕秀蕙、张宏达各位老前辈和朱澈、王文采、王献溥、高谦、傅立国、郭本兆等各位先生在会议期间审阅、修改或提出宝贵的意见。老前辈俞德浚教授更是关怀备至，每当想起有遗漏欠妥之处，就随时通知我们。我们根据各位老前辈和先生们的意见在原稿上修改后，又送给老前辈秦仁昌教授作了最后修改。但定稿后，又有几位先生提出意见，我们又根据建议稍作补充。此前言我们只是写了初稿，经过很多位老前辈和先生们的修改，才得以与读者见面。我们对这些位老前辈和先生们谨表示衷心的感谢。编写前言初稿时我们参考了很多位先生的著作，特别值得提出者是前言中古典植物学公元前的一部分我们是参考了植物学界老前辈夏纬瑛教授赠给的著作写出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汪子春同志听到我们写这一前言时，把他写的关于“李善兰：植物学”考证的油印稿赠给我们参考，对此我们也一并致以谢意。

因本书要求印刷出版较急，植物学会办公室王志英同志为了联系印刷出版工作，曾付出了很多的劳动。科学出版社的于拔、曾建飞和翟汝康同志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并对编辑出版工作付出了大量的劳动。科协的各级领导对本书的出版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均此致谢。

《中国植物学文献目录》编辑组

1982年8月

说 明

(1) 本书所收文献为我国学者所著译的近代植物学论文和书籍, 期限至1981年为止。我国学者与外国学者合作的文献也一并列入, 但都注出。以近代植物学方法研究我国古籍的文献也收入目录, 但纯粹古籍选与植物学有重要关系者另列一目录附于书后。

(2) 本书所收文献以原始论文、综述和提高性的论著为主, 翻译和通俗性文献则选择收集。材料来源主要根据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期刊、专刊和图书, 并参考有关的国内外文摘、文献目录等二次文献和各位植物学家寄来的个人著作目录。报纸及内部刊物登载的文章未收, 只在一定范围内流通未公开发行的文献未收。解放以前出版的翻译文章和书籍都选择收集, 解放以后出版者只选收翻译书籍, 不收翻译文章。通俗性文章选收比较完整者, 纯属报道性的短文未收。

(3) 与农、林、园艺、药学、化学等学科交叉的文献, 属于植物学范畴者收, 如作物生理、作物病理、作物遗传、引种驯化、农林生态以及栽培植物的分类、形态和细胞学观察实验的文献都收。但农林丰产经验、经营管理技术和一般栽培技术的文献未收。药学方面的文献, 植物性药物的分类、栽培、生药鉴定、成分分析的文献收, 药理及临床的文献一般未收。在化学方面, 研究植物有机及无机成分和生物合成者都收, 但专门研究某一成分人工合成者未收。

以上是本书收集资料时商定的一些范畴, 但在收集过程中由于每人掌握的尺寸不同, 因而本书所收的文献也不完全平衡。

(4) 本书文献按作者和译者排列, 作者按姓名汉语拼音字母排列。同一作者的多篇文献按年代排列, 同一年代的多篇文献按出版先后排列, 并注以 a, b, c, d。多作者的文献按第一作者姓名排列, 但其他作者姓名也照原顺序列出, 并于各自的汉语拼音处设参见条。如某乙学者参某甲学者, 即表示在某甲著者条下有与某乙著者合作的文章。作者用过的西文姓名都加括号附于中文之后。作者的西文姓名与汉语拼音不一致者在其字母顺序应排处设参见条, 但与汉语拼音一致或相差很少因而排于原西文字母顺序附近易于查找者不再设参见条。我国学者用西文发表的文献凡能考证出中文姓名者, 都注出中文姓名, 按汉语拼音排列, 考证不出者则用原文按字母顺序排列于应排之处。用笔名或别号发表的文献能考证出原名者即排于原名文献之中, 考证不出者按所用笔名别号汉语拼音另行排列。少数未标明作者的文献列于“无著者”条下, “无著者”文献仍按上述方法排于汉语拼音“无”字处。集体著作以单位署名者按单位名排列, 以个人署名主编者按主编姓名排列, 副主编以及各章节的作者不再著录。论文集与期刊同样看待, 每篇文章都作为一篇文献著录。多单位的集体著作排于第一单位名称之下, 并照原文列出其他单位名称, 但不设参见条。我国学者与外国学者合作的文献, 如我国学者为第一作者按第一作者姓名排列, 并照原顺序列出其他作者姓名; 如我国学者为第二作者仍按我国学者姓名排列, 在括号内注出与某某学者合作, 外国学者姓名不设参见条。翻译作品按译者姓名排列, 在本条文献之后注出译自何人著作。

(5) 本书文献著录的顺序是：1. 作者（或译者），2. 出版年，3. 题目，4. 期刊名称，5. 卷期，6. 起讫页数。中文文章附有西文题目或摘要者，题目用中文，括号内加注西文题目。西文文章用西文题目，括号内加注中文题目，如原文有中文题目则用原文，如原文无中文题目由编者代译，期刊名仍用西文。

(6) 期刊卷期页的著录照国际间现时一般流行的方式：

3(1)：55—60即第3卷第1期第55页至60页

2：6—10即第2卷第6页至10页

1954(2)：80—90即1954年第2期第80页至90页

(36)：1—6即第36期第1页至6页